

台共党人的 悲歌

一个台共党人的背影
一群信仰坚定者的奋斗

近代中国历史缩影里的一曲挽歌

蓝博洲
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 WORLD AFFAIRS PRESS

台共党人的悲歌

蓝博洲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共党人的悲歌 / 蓝博洲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086-4677-0

I. ①台… II. ①蓝… III. ①张志忠-生平事迹 ②季云-生平事迹 IV. ①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2780 号

台共党人的悲歌

著 者: 蓝博洲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677-0 / K · 378

定 价: 39.80 元

印 张: 22 字 数: 320 千字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序 言 / 001

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 / 汪晖

序 曲 杨扬之死

032

一九六八年，作家柏杨收到台湾共产党后人的遗书后，在自己的专栏上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引出了一曲台共党人的慷慨悲歌……

第一章 张志忠

039

抗日战争结束，日本殖民地台湾回归中国以后，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与溃败，恰恰是从张志忠抵达台湾而展开。

第二章 季 沅

109

张志忠从上海带回来的新娘名叫季沅。从季沅的生命史来看，她后来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是跟整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第三章 张志忠与季沅

137

地下党的工作行踪不定，张志忠与季沅只能通过与家人书信往来得知彼此下落。关于一家三口被捕的经过，国民党官方档案里有种种不同的记录乃至相互矛盾的说法。

第四章 小 羊

311

季沅与张志忠先后被枪决后，关于小羊及其妹妹的下落，却一直有着那样不切实际的传说。

尾 声 为了忘却的纪念

323

张志忠与季沅的历史长久被湮灭，记录这个故事，只盼将来总会有人记起他们，说起他们吧！

大事年表

后 记 / 343

为我补课的博洲大哥 / 陈键兴

注：本书引用了较多历史资料，如信件、档案文件、已出版书籍等，为保持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引文部分有措辞欠妥之处均未修改，以存其原貌。所有引文内的【】内容皆为作者所增。特此说明。

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

——《台共党人的悲歌》与台湾的历史记忆

汪 晖

1993年年末，在多年查访之后，蓝博洲终于来到嘉义新港通往云林北港的公路旁一处荒芜的墓地。这里埋葬着两位死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留在人间后来却自己结束生命的孩子。几十年来，没有外人寻访这处荒坟，即便墓中人的亲人也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如果没有作者长达十多年的调查、寻访和研究，除了留在白色恐怖时期的官方档案中的名字，他们或将永远沉没于黑暗之中。读完全书，我才明白了作者沉重的慨叹：“这座寻常的坟墓竟然埋葬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而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以及被黑暗的历史侵夺的一家三口的悲剧。”《台共党人的悲歌》（以下简称《悲歌》）一书以实证资料和当事人口述为据，勾勒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其后“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台共党人的悲壮故事。作者通过这个

被埋葬的“现代史”的发掘，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这的确是一段深埋地下的、被遗忘了的“台湾近现代史”，那么，在半个多世纪中，通过取消了这段历史而形成的台湾近现代史到底是什么史，或又能是什么样的史呢？

—

蓝博洲是苗栗客家人，1979年考入辅仁大学法文系。这一年中美建交，岛内政治生态丕变，中国大陆也正处于另一场巨变的开端。1981年，在担任辅大草原文学社社长期间，蓝博洲邀请杨逵、陈映真等乡土文学作家来学校演讲。杨、陈都是台湾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人、非党的左翼人士。陈映真是1977年4月至1978年1月间发生的、受到国民党政权压制的“乡土文学论战”的主要参与者，而杨逵则是在乡土文学论战中被挖掘的、具有乡土性的左翼抗日作家。与此同时，蓝博洲也偷偷阅读鲁迅和中国左翼文学作品。^①通过地下流通的吴浊流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花果》，他也接触到长期不能言说的“二二八”历史。正是经由这一摸索过程，蓝博洲开始用文学方式探索台湾现代史，踏上了重建台湾现代史与中国革命之历史联系的道路。他毕业于法文系，却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潮流岔道而行，将自己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左翼现实主义传统之中。

蓝博洲的文学生涯开始于台湾历史的转折关头。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台湾进入了一个浪潮汹涌的新时期。就在那一年年初，蓝博洲加盟陈映真主持的《人间》杂志，参与了关于“二二八”事件40周年的民众史专辑制作小组。同年7月，他在《人间》杂志发表《美好的世纪》，讲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郭琇琮大夫的故事，次年又发表《幌马车之歌》，将另一位“五〇年代

^① 台湾“《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规定所有出版物在发行时必须检送省保安司令部（后改为警备总部及地方警察局）检查，禁书包括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茅盾、郭沫若等作家的作品及左翼思想著作。

白色恐怖”受难者锺浩东校长的生命史奉献于读者面前。台湾医生的抵抗传统、台湾革命者的悲壮奋斗，以及台湾左翼文学的历史脉络，构成了贯穿蓝博洲的文学和历史写作的主要线索。这些作品以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及之后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为背景，试图通过被遗忘的历史的回溯向酝酿着巨变和激烈历史/政治争议的台湾社会发问。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中留下了《幌马车之歌》的影子，而《好男好女》就是根据这部作品改编。即便如此，在新的潮流中，蓝博洲的作品遭受更多的可能是漠视、拒斥和有意识的遗忘。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两岸分治局面的形成是台湾历史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意义可从两个方面加以把握，首先，由于新中国的建立和国民党退守台湾，国共内战进入了一个以两岸分治为基本格局的时期，我们甚至可以从戒严令的颁布本身看出：分治格局事实上是国共内战的延伸。台湾戒严令的名称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一号》”，由警备总司令陈诚颁布于 1949 年 5 月 19 日，并于次日实施，距离“国民政府”于 1949 年 12 月迁台约半年时间。在那之前，1948 年 12 月 10 日，国民政府于南京宣布第一次全国戒严令，台湾及新疆、青海、西藏、西康等距离国共争夺的主要战场较远的地区不在戒严令范围之内；1949 年 7 月 7 日，代总统李宗仁还曾颁布过第二个全国戒严令，但很快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全面退守台湾。实际上，《中华民国刑法》第 100 条（内乱罪）原本为 1928 年刑法草案内容，1935 年 1 月 1 日正式颁布，但备而不用，至 1950 年台湾戒严时期开始实施，1992 年修订。两份全国戒严令在大陆的迅速废止和台湾戒严令的漫长延续（38 年又 56 天）之间有明显的连续关系，它们共同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巨变和国民党政权的历史命运。

其次，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两岸进入冷战时期。伴随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琉球成为美军在远东的最大军事基地，台湾与韩国、南越成为美国推行亚洲冷战政策的前哨阵地和遏制红色中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所谓“戒严时期”实际上是内战和冷战交叉重叠的

产物。由于这一陈映真称之为“双战构造”^①的历史条件，两岸关系处于对峙和冷战结构下，但不存在类似朝鲜半岛那样的双重承认的国际政治。^②实际上，无论是两岸关系，还是围绕两岸的国际承认关系，始终处于“双战”的延伸状态之下。在这个意义上，两岸的和平最终取决于能否创造新的政治以彻底解决“双战”带来的隔绝、对立和敌意。

在戒严时期，国民党在台湾实行党禁、报禁、出境旅游禁等政策，并对共产党人、左翼人士进行残酷镇压，甚至许多并未真正卷入左翼运动的青年也惨遭杀害。戒严法颁布后，国民党“政府”又颁布《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和《惩治叛乱条例》等，1952年颁布（1958年修正）的《出版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停止

① 陈映真：“一九五〇年后，在东西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战构造’下，在美国武装介入台湾海峡的条件下，台湾和中国本部分离……历史地看来，这也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与中国反控制斗争的力学关系的结果。”参看陈映真：《台湾史琐论》，《历史月刊》（台北），1996年10月号，第50页。

② 陈映真也借鉴了韩国知识界为描述朝鲜半岛南北关系而创制的概念“分断体制”，但不是全盘接受。用白乐晴的话说，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是“理解南北韩这两个不同‘体制’（亦即两组社会机构）如何复杂地在与彼此的奇妙缠结之中自我再生产”。“分断体制理论的前提是，若我们把南北韩的两个‘体制’孤立起来看，或将自己局限在‘体制’这个字的两种面向上而已（亦即只有作为世界体系和两韩各自的体制），那么朝鲜半岛上的分断情况就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在这座分断半岛上的现实，牵涉到南北韩之间某种程度上的互相依赖及对立，此外还有外国势力的持续影响。”（白乐晴：《使超克分断体制运动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见罗小茗编《制造“国民”》第一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白乐晴关于南北韩两个不同的“体制”在相互纠缠中自我再生产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朝鲜半岛的格局不同于两岸关系，也不建议在两岸关系的意义上使用分断体制概念，理由是“分断”和“体制”这两个概念都易引起误解：一、围绕两岸关系的国际承认体制不同于南北朝韩；二、两岸人民日常生活形态的共同性远远高于其差异；三、两岸分隔是双战构造的绵延及后冷战秩序的巩固，但远未体制化。实际上陈映真本人亦未简单移用“分断体制”概念。在《一个“新史观”的破绽》（《海峡评论》82期，1997年10月号）等文中，他更常将“分断”（而非“分断体制”）直接同“国家”或“民族”之类的概念相联系，比方“分断祖国”、“分断民族”、“两岸分断”。

集会、结社、请愿，取缔被认为“与军事有妨害”的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书、告白、标语及其他出版物。配合戒严法的实施，1954年又发起以铲除“赤色的毒”、“黄色的害”、“黑色的罪”为目的的“文化清洁运动”。白色恐怖蔓延整个戒严时期，但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镇压最为惨烈，以致“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已经成为专有名词。然而直至今日，戒严时期遭迫害的人数却仍然只能依据民间自己的统计。1992年起，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开始在枪决地下党人的知名刑场“马场町”公开追悼死难者，初期能够掌握的死难者名单仅1010人。^①另据陈映真估算，“1949年年底到1953年，台湾发动了大规模、长时间的‘白色恐怖’，枪杀了近5000人，把8000至10000人投狱。”^②伴随着戒严令的解除，如何面对和解释戒严时期特别是“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本应成为台湾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但有关白色恐怖的调查并没有像“二二八”事件那样成为台湾社会的震撼性事件；实际上，“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往往被刻意编织在“二二八”事件的相关叙述中，导致一般人分不清楚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伴随两岸关系的转变，大陆和台湾如何面对二十世纪中国

① “今天，追悼会场上悬挂着一千零十一个名字。其间有我们的亲人，有我们的僚友，也有生前互不相识的名字。有三分之二是生于斯、死于斯的台湾本地人，也有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的大陆同胞。”参看：林书扬：《五〇年代政治案件殉难者春季追悼大会声明（1995年4月2日）》，《林书扬文集》第二卷，台北：人间出版社，2010年，第144页。另据台湾真相与和解促进会截至2013年的统计，戒严时期的政治死刑犯名单为1061人。

② 陈映真：《在白色恐怖历史的证人席上发言——序王欢先生〈烈火的青春〉》，王欢：《烈火的青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证言》，台北：人间出版社，1999年。陈映真在为蓝博洲《幌马车之歌》所写的序言《美国帝国主义和台湾反共扑杀运动》中说：“美国支持国民党在一九五〇年韩战爆发以后以迄一九五四年，在台湾进行持续性、广泛而残酷的政治扑杀运动……杀害了四千至五千个本省和外省的‘共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也将同样数目的人投入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牢狱之中。”（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另据谢聪敏估算，戒严时期的被捕人数为29407人；而按王升的说法，处死人数占被捕人数的15%，即4500人左右。参看：陶涵：《台湾现代化的推手——蒋经国传》，林添贵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229—230页。

革命及其在两岸的不同情势，也是一个难以绕开的问题，但同样没有成为反思的焦点。

在蓝博洲沿着杨逵、陈映真的左翼文学道路前行的时刻，台湾党外运动渐成声势。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迎来巨大变化，并在台湾引发激烈震荡。就在这一年，美国将琉球“归还”日本，一并被美国交由日方管制的，还包括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地理上均不属于琉球的钓鱼岛。这一事件在北美台湾留学生中率先触发了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保钓运动”是对中美关系变动的一种独特回应，并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降在中国和西方世界同时爆发的“造反”运动和反战运动的余波相互激荡，其中包含了左翼的、自由主义的、支持统一及极少数带有独立取向的多重成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是在六七十年代反战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中产生的青年运动，它自觉不自觉地揭露了台湾对于美国的依附地位，冲击了五十年代以来的两岸冷战格局。在这场运动中，包括许多出身于国民党人家庭的台湾青年，通过重新审视红色中国的存在，开始了他们的穿越太平洋之旅。“保钓运动”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我们或许可以视之为两岸冷战状态走向终结的一个开端。

“保钓运动”是否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的先声，这里暂且不论，但显然历史并非朝同一方向延伸。1978年12月16日，美国通知台湾即将与中国大陆建交，隔日，蒋经国颁布紧急处分令，宣布终止一切选举活动。12月25日，许信良、余登发等人发表《党外人士国是声明》，要求恢复选举，在此前已经出现的各种台湾住民自决论的延伸线上^①，提出“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从1979年1月起，党外运动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直至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高雄“美丽岛事件”爆发，党外运动达到高潮，国民党戒严体制受到严重冲击，一个新的变革时代到来了。1986年9月28日，在蒋经国解除戒严前不到一年的时刻，由132人

① 比方1964年，彭明敏与谢聪敏、魏廷朝共同起草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以及1977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表所谓《人权宣言》。

参与的党外后援会推荐大会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临时转变为组党大会。随后民进党参加了“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选举。台湾从此进入了两党竞争的时代。在讨论“解严”问题时，多数学者将大批留学生返台、小剧场运动及文化讨论的活跃及蒋经国的开明姿态作为主要因素，这固然不错，但笼罩在被美国抛弃的怨恨氛围中，蓝绿两造很少有人意识到：中美建交不但是毛泽东为突破冷战两极构造而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打破国民党戒严体制的关键因素之一。^①若无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和中美、中欧关系的巨变，“保钓运动”、戒严时期的终结及此后台湾的政治变化能否以这样的速度和方式发生，是不能确定的。然而，戒严体制结束不久，历史就走到了1989年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体系瓦解的时期；在美国霸权体系之外寻找社会变革道路的可能性大大缩小了。李登辉从制定和颁布“国统纲领”到完全弃之不顾，只用了3年时间（可以1994年他与司马辽太郎的谈话为依据），恰是这一双重变迁的结果。在所谓“历史终结”的氛围中，台湾社会在“世界民主第三波浪潮”中获得了新的定位。

台湾党外运动是在“戒严时期”形成的反对运动，其中包含某些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成分，但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以及台湾岛内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传统殊少关联。此时共产党和革命左派势力已遭剪除，命悬一线，唯有在“乡土文学”旗帜下和为数极少的左翼社会运动中，尚余继承现代民族民主革命传统推进台湾民主的文化一脉，如同一个历史的地标，昭示着当代台湾的民主运动与近现代台湾民族民主革命之间的历史关联。因此，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党外运动是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以降冷战和内战共同造成的断层中产生的，对于不满于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年轻一代而言，“戒严时期”的主

^① 这里没有篇幅全面讨论中美关系的改变对于亚洲区域关系的影响，也不能深入讨论这一改变对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和人民要革命”的潮流的影响。可以确定的是：中美关系的改变带动了中日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变，而这一区域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武装斗争也明显因此遭遇挫折并走向终结。中美关系的改变为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提供了条件，由于国际承认关系的改变，国民党的合法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得不在内政上做出妥协，并逐渐地向本土化方向发展。

要思想资源和活动空间来自战后在台湾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美国。如今，当人们试图梳理台湾学生运动和民主思想的变迁时，也多半会追溯至五十年代的《自由中国》、六十年代的《文星》、《大学》及七十年代的“保钓运动”；这个脉络的外部——或许是较内部更为决定性的因素——则是由美国传入的自由主义（虽然它的内部构成也较复杂），其特征是在以追求民主和自由相号召的同时，共享反共的意识形态。^①

在经历了“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肉体消灭和残酷镇压之后，台湾的左翼又面对岛内政治生态的巨变和1989年后国际社会主义的衰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经济发生转型，资本向大陆转移，岛内劳工力量下降，阶级性社会运动尚未真正成长便面临衰落之势；由于李登辉的“国族打造工程”的收编作用，尽管环境运动、农运和学运等仍继续活动，但力量和方向已有重大变化。代之而起的，是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中心的新社会运动。除了极少数敏锐的思想者和运动者，大多数人并不关心海峡两岸的劳动分工及不平等的劳资关系，而更倾向于从“统独”的角度读解两岸关系。在这样的语境中，甚至实际上不过是“独台”（如“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的宣称）与“台独”之间的路线分野也被理解成“统独”斗争。围绕“统独”问题，民族认同、族群关系、“国家建设”，以及以此为中轴而编织新的台湾史，成为支配现实政治和历史想象的基本要件。

在新的语境中，左翼社会运动所针对的阶级和社会结构问题逐渐转化，新的、以左翼的色彩登上舞台的一代，已经是由后结构主义理

① 当然不是没有例外。早期党外运动包含某些社会主义成分，故其中一些人对新中国的态度有所不同。1976年苏新之女苏庆黎主编《夏潮》(China Tide)，在戒严时期后期公然开启“左翼”的思想路线，其策略之一就是“出土”被遗忘的日据时期的“乡土文学”。陈明忠是支持《夏潮》创刊的灵魂人物，他在“二二八”事件时参加“二七部队”敢死队，白色恐怖时期被捕入狱，刑期十年，1976年又以通共、阴谋叛乱（策反岛内政治人物黄顺兴潜赴大陆）等罪被判死刑，后经海外保钓等组织的救援改判15年，1987年保外就医。陈映真等参与了该刊的编撰活动。蓝博洲中学时期受到《夏潮》“左翼”启蒙，后来亦曾任夏潮联合会会长。

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等武装起来的、以留学欧美（尤其是美国）的青年学者为主的新生代。无论是思想资源，还是其置身的情境，均与此前几代人完全不同。在政治上，较之与台湾左翼传统的关系，这些新的运动与其批判对象的关系或许更为深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及“现代主义”论战、八十年代的党外运动、九十年代的“野百合”学生运动，综合了泛左翼、自由主义和其他社会力量，开启了民主变革的历史潮流，但从九十年代初起，伴随蓝绿体制的巩固，台湾社会运动的主导方面已经被“统独”问题所裹胁，甚至直接针对台湾社会内部矛盾的学生运动也不能幸免。例如，2008年的“野草莓”学运和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是对台湾社会内部矛盾的回应，包含了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及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却各以反两岸“大三通”和反两岸“服贸”协议为契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推动、台湾冀望加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不但是一项新自由主义计划，而且包含着遏制中国大陆、赓续冷战格局的清晰意图，但在新社会运动和学生运动中虽偶尔有人触及，却从未深入分析，更谈不上纳入政治行动纲领。正由于此，这些运动向新方向的突围尚未展开，便在不同力量的驱使之下再入老“围城”。换句话说，从五十年代肃清以后，作为中国革命与亚洲革命之一翼的台湾左翼传统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蓝博洲的“现代史考古”和“文学史钩沉”便诞生于这一语境中。他查阅档案，采访当事人，奔波于里巷坟头、乡村都市、台湾南北、海峡两岸，劳其心智、苦其行役，可谓艰苦卓绝。《悲歌》出版于2012年，但初稿于1994年3月16日即已完成，后经2007年3月16日二稿、2009年10月1日三稿、2010年6月6日四稿、2010年7月1日五稿、2011年1月25日定稿，前后历经长达17年的反复修订和增补过程。在酝酿、写作和修订这部书的近20年的时期里，作者出版了大量与“二二八”事件、“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相关的书，例如《沉尸·流亡·二二八》（1991）、《日据时期台湾学生运动（1913-1945）》（1993）、《白色恐怖》（1993）、《寻访被湮灭的台湾

史与台湾人》(1994)、《高雄县二·二八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民众史》(1997)、《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区案件调查与研究》(1998)、《人间正道是沧桑：苗栗县文学家作品集》(1999)、《吴浊流的文学原乡：西湖》(与林灵合作编写制作，1999)、《共产青年李登辉》(2000)、《麦浪歌咏队：追忆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2001)、《天未亮：追忆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师院部分)》(2001)、《台湾好女人》(2001)、《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2001)、《藤缠树》(2002)、《红色客家人：一九四〇、五〇年代台湾客家人的社会运动》(2003)、《红色客家庄：大河底的政治风暴》(2004)、《消失的台湾医界良心：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下受难的高贵灵魂》(2004)、《二二八野百合》(2007)、《青春战斗曲：二二八之后的台北学运》(2007)、《消失在二·二八迷雾中的王添灯》(2008)、《战风车：一个作家的选战记事》(2009)、《老红帽》(2010)、《寻找祖国三千里》(2010)、《你是什么派》(2011)等。

由于长期的研究和积累，蓝博洲对于档案调查、人物采访、文献实录等形式已经驾轻就熟，他可以像写侦探小说一样，从一个看似偶然的青年自杀案开始，通过国民党档案资料、不同的当事人回忆及其他线索，剥茧抽丝，逐条比对，去伪存真，重建台共领导人张志忠、他的妻子季沅和儿子小羊的生命史。在对“二二八”事件、“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调查的同时，蓝博洲自觉地钩沉台湾左翼文学的发展脉络，重建这一文脉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传统之内在关系。在他的笔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鲁迅)、四十年代文学抗争(宋非我、简国贤、吕赫若、雷石榆、蓝明谷、吴浊流)、七十至八十年代乡土文学(陈映真、黄春明等和被重新挖掘的杨逵)的展开，如巨石压迫下的野草，命悬一线，不绝如缕，而在字里行间，作者踵武前贤，自觉地承担起这一传统的挖掘者、继承者和开创者的使命。这一文脉是在日本殖民统治和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浴血成长的生命之树，也是在岛内政治生态巨变、左翼文学传统边缘化的境遇中逆风向前的车轮，其前仆后继，宛如悲壮的史诗。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在历史断层中赓续文脉的努力，如

何阐释蓝博洲以如此坚毅的方式呈现这一“为了忘却的记念”？

二

蓝博洲的写作以报告文学（台湾学者称为“报导文学”）和历史调查为主要形式，诉诸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这一以“信史”的形式展开的叙述是论辩性的，它同时针对了蓝绿两个阵营的主导叙述，即“台独”叙述与国民党的正统叙述及其变体。对于前者，他的立场是反对殖民统治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对于后者，他的立场是反对白色恐怖和专制统治的大众民主的左翼运动。通过漫长的调查，在他的笔下，日据时代台湾民众和革命者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战后台湾民众和革命者反对国民党暴虐统治的斗争、“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左翼进步人士的奋斗和牺牲，渐渐以具体可感、清晰真实的方式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他勾稽其间的连续与变化，又将这些连续与变化置于与中国革命及建国运动的关系之中，展开了一幅生生不息、广阔深厚的历史画卷。

这幅画卷的形成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政治的巨变是同步的，或者说，作者正是以此介入这场蓝绿主导的、围绕历史观而展开的战争。在这场历史观战争中，国民党处于守势，攫取了党外运动领导权的民进党则处于攻势。在“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口号之下，新台湾史写作以省略和扭曲的叙述策略，遮蔽台湾左翼传统的历史脉络及其对民主运动的历史贡献，重构台湾的悲情。这一扭曲的历史脉络对于台湾的新社会运动，尤其是新生代对于两岸关系的历史观点和思想情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新的台湾史叙述是一个包含若干层次但并不复杂的叙述：最表层的部分是将台湾历史无差别地视为殖民史，将民进党上台前的台湾政权一概视为外来政权，并依次排列出西班牙、荷兰、郑成功、清朝、日本和中华民国的殖民地序列。

以这一“外来政权史”为框架，新的台湾史叙述又对这一历史序列的内部关系进行重组：首先，通过抬高日本殖民统治（以及荷兰

殖民统治)的“文明程度”或“现代化水平”,将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置于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对立之中,塑造殖民地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优越感;其次,通过日本殖民统治与“二二八”事件的对比,实际上为“皇民化”开脱(即在对比的意义上将其合理化),进而将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怀旧”组织到“台独”(也即区分于中国大陆,而与日本、美国主导的秩序相调和)的氛围之中;第三,尽管存在少数对中国革命和革命中国持同情和理解态度的人,但用美式自由主义包装冷战与后冷战的台湾政治结构,贬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切断台湾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连带,却是台湾史叙述的主流。在台湾,以“共产主义”和“威权”概念指称中国大陆,并以此掩盖冷战时代的台湾与美国帝国主义统治的宗主—殖民关系,是贯穿各主流派别政治修辞的共同语汇。

将台湾建构为“中国的他者”的客观力量与其说是台湾岛内的政治运动,毋宁说是两个形态不同的统治秩序,即“二战”结束前的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和“二战”结束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的美国主导下的内战冷战体制。1954年签订的“《美中^①共同防御条约》”,与美日、美菲协防条约性质一致,旨在以武力遏制中国、以条约规范台湾行为(如不允许主动进攻大陆)、以联防形式阻止共产主义渗透,最终造成了台澎主权未定的格局。^②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单方面颁布《与台湾关系法》,以国内法形式替代“《美中共同防御条约》”,以维持两岸对立和分隔的既定格局。“台湾人的命运由台湾人来决定”这一口号本来包含着反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内涵,但当这一口号被转换为针对中国大陆的独立运动时,其含义恰好与两种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造成的分隔局面相互呼应,从而以自治或独立的名义巩固了这一统治。由于不得不借助于“中华民国”这个政治外壳,“台独”运动

① 指蒋政权,全文同。——作者注

② 该条约涉及范围为台湾及澎湖列岛,而不包括台湾当局实际治理的金门、乌丘、马祖、东引、东沙和南沙群岛。1979年美国以国内法形式颁布的《与台湾关系法》第15条也继承了“《美中共同防御条约》”的上述范围。